

俄藏敦煌  
漢文寫卷  
叙錄

上册

孟列夫 (Л.П. 緬希科夫) 主編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ДУНЬХУАНСКОГО ФОНДА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  
漢文寫卷叙錄

上 冊

孟列夫(Л.Н.緬希科夫) 主編  
М.И.沃羅比耶娃 – 捷霞托夫斯卡婭  
И.С.古列維奇 孟列夫 В.С.斯皮林  
史更良(С.А.什科利亞爾) 編撰

袁席箴 陳華平 翻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И. С. ГУРЕВИЧ,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В. С. СПИРИН, С. А. ШКОЛЯР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ДУНЬХУАНСКОГО ФОНДА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выпуск 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3

責任編輯 蔣維崧  
裝幀設計 嚴克勤

俄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

(全二冊)

孟列夫(Л.Н. 羅希科夫)主編

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袁席箴、陳華平翻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44 125 插頁30 字數1 099,000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2444-2

Z·323 定價 88.00元

## 出版說明

本書是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Л. Н. 緬希科夫)主編的《俄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第一冊、第二冊的中譯本,分上下兩冊刊行。原書名《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由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前身為東方文學出版社)于1963年、1967年分別出版。

作為當今敦煌文獻四大藏家之一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由于歷史的原因,其藏品長期與世隔絕,詳情鮮為人知。孟列夫主編的這兩冊《叙錄》的出版,雖然僅涉及約三千號文獻,只占俄藏總量的六分之一,但畢竟使其面目大略為世人所知,故出版後在敦煌學界引起巨大的震動是理所當然的。

自1992年起,本社開始影印出版《俄藏敦煌文獻》,以後還將編製反映俄藏敦煌文獻全貌的叙錄。目前,先將孟列夫主編的兩冊《叙錄》翻譯出版,以供學術界需用。

本書由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組織翻譯。本社赴俄工作人員利用直接識讀原卷的便利,會同孟列夫主編,并參考海內外包括俄羅斯漢學家在本書出版後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對原書的部分內容作了不少增補刪改,使中譯本的質量有了明顯提高。當然,囿于原書格局,改動畢竟是有限的。為了便于中國讀者使用,本社按中文筆畫順序重編了書名與專有名詞索引,對原為俄國讀者編製的音譯縮語等索引則作了刪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3月

· 1 ·

## 譯者前言

俄羅斯所藏敦煌文物，主要是科學院院士 C. Ф. 奧登堡于 1914—1915 年間率隊來敦煌考察時獲取的。現在藝術品部分藏于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寫本部分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其中少量文獻得自中國新疆等地。

1920 年阿列克謝耶夫的《蘇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漢文和朝鮮文藏卷》(載聖彼得堡出版的《科學通報》)和 1922 年奧登堡的《千佛洞》(載《東方雜誌》第 2 卷)透露了蘇藏敦煌寫本的點滴情況。1917 年日人矢吹慶輝、1931 年法人伯希和對其有所接觸，曾簡單地提及和介紹了其中幾卷寫本。三十年代，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人員弗盧格對部分敦煌寫本編了簡目，即《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漢文寫本(非佛經之部)簡報》(載《東方學圖書目錄》1934 年 7 期)和《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漢文佛經古寫本簡目》(載《東方學圖書目錄》1936 年 8—9 期)。不幸的是弗盧格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編目工作因而中斷。

1957 年，鄭振鐸在蘇聯訪問期間，曾瀏覽過部分敦煌文獻。但由於鄭振鐸于 1958 年 10 月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沒有來得及公開發表其見聞，只在寫給徐森玉的一封信中略有提及。此信遲至 1986 年才公開發表，所以此前其詳細情況不為國人所知。

1960 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上，蘇聯宣布了藏有敦煌卷子的消息，并由列寧格勒分所陳列了敦煌遺書若干件，供與會各國學者參觀。至此，國際上才知道蘇聯藏有

驚人的敦煌文獻，引起轟動，但具體情況尚不大清楚。

1963年和1967年，孟列夫主編的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文獻漢文寫卷叙錄》（以下簡稱《叙錄》）第一冊（東方文學出版社，莫斯科）和第二冊（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輯部，莫斯科）出版，此為蘇聯首次系統介紹列寧格勒所藏敦煌漢文寫本。第一冊介紹1707號（本書1—1707），第二冊介紹1247號（本書1708—2954）。據編者稱，這兩冊《叙錄》所著錄的寫本約當總數的三分之一弱。

1975年，蘇聯學者費德林在文章中提到，蘇藏敦煌寫卷總數為12000號。

1983年，吳其昱受法國國立科學研究所派遣，前往列寧格勒訪問，閱讀了部分敦煌寫本，并盡10日之力，對整個敦煌寫本收藏情況作了初步了解。1986年，吳其昱在臺北舉行的“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上提交了《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論文（載《漢學研究》1986年4卷2期《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比較詳細介紹了蘇聯藏品的基本情況。據此文并結合其他材料，我們對蘇藏敦煌寫本已有大致的了解。

首先，碎片很多。所藏敦煌卷子共11375號，大致可分五部分：（1）Φ-1至Φ-325，即三十年代弗盧格所編號碼。（2）Дx-1至Дx-2800，為東方研究所入藏號。Дx即“敦煌”兩字俄語音譯的縮寫。上列二項已編入孟列夫兩冊《叙錄》中。孟錄編至2954號，與入藏號不同，入藏一號，孟錄有分為兩號或數號者。又Дx-1至Дx-2800中，亦有少數孟錄未收入者。按寫本長度超過62cm者經初步統計僅259號；又寫本長度不及1cm者經粗略統計約1889號。（3）Дx-2801至Дx-9584，共6784號，大都為手掌大小或更小之碎片。（4）Дx-9585至Дx-10150，共566號，非敦煌所出。外加孟錄9號，亦出于黑水城，共575號。（5）Дx-10151至Дx-11050號，共900號。約一紙上下或更小的碎片。其中11

號有號無物，實際只有 889 件。由上可知，遺書總數為 11375 號，減去非敦煌所得 575 號，敦煌寫本共 10800 號。其中小碎片 6784 號，再加孟錄中紙張不及 31cm 者其中亦有相當數量小碎片，約 1849 號，二者共約 8633 號。長度等於或超過 31cm 者，只有約 2200 號。

其次，佛經很多。據孟列夫《叙錄》一、二冊初步統計，佛經約占 86%，其比例與倫敦、北京所藏相近。

再次，時有孤本珍本。如《鄭虔殘札》(Дх - 10839)、《孟蘭盆經講經文》(Дх - 10734)、《曹宗壽造帙疏》(Φ - 32a, 孟錄 1696)、《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授百姓部田春苗歷》(Дх - 1328, 孟錄 1570)等。

另外，寫本起迄年代也很值得注意。在一萬多號遺書中，紀年最早的是北涼緣禾三年(即北魏延和三年，公元 434 年)《大方等無想大雲經》(孟錄 2245)，較晚的為“大宋咸平五年”，即公元 1002 年(孟錄 1696)。從而打破了伯希和所說敦煌無十一世紀初年卷子的陳說。

1983 年初，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立，即將翻譯孟列夫《叙錄》列為本所重點課題之一，以期為敦煌學界提供一本有益的工具書。所長陳守忠主持并指導了翻譯。譯稿由袁席箴和陳華平分工執筆；後因陳華平調離，其承擔的未譯完部分，由袁席箴補譯；最後由袁席箴對全書修改、校對、通稿。全部翻譯工作歷時三年。

本書翻譯出版過程中，得到本所全體同志的熱心關注、支持。特別是王宗元、蹇長春、李并成做了大量工作，王永曾同志在複印原稿和與出版社聯繫方面也做了必要的工作。西北師大中文系趙達夫為本書出版積極聯繫，傾注了許多心力。上海古籍出版社認真審閱、校訂全書，付出了辛勤勞動。在此，特表謝忱！

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1992 年 11 月



## 中文版序言

本書是多年前出版的，第一冊出在 1963 年，第二冊出在 1967 年。從那時起，多次有評論文章發表，最初是法國 (Paul Demièrle) 和日本 (金岡照光)，後來在新加坡 (陳鐵帆)、臺灣 (蘇瑩輝)、德國 (Bersing) 都有了反響。本書出版後十幾年，蘇聯和中國學術界恢復了中斷多年的聯繫。在中國，敦煌學研究一度停頓，從八十年代起，得以重新恢復。這以後，對外國同行的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包括對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東方研究分所 (現名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做的工作。由于這本書已較難找到，幾乎成為“善本”，所以有了重新出版的需要。1986 年在中國臺灣出版了黃永武主編的《敦煌遺書最新目錄》，但對本書僅僅是譯目，沒有翻譯敘錄本文。中國學者從 1984 年到 1986 年開始組織翻譯，在《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西北師院學報》上發表了本書兩冊序言的譯文 (姬增錄、舒朋、陳華平、袁席箴譯)，同時周丕顯在《敦煌遺書目錄再探》(《敦煌學輯刊》1986 年第 1 期)，白化文、楊寶玉在《敦煌學目錄初探》(1989 年版) 中都很仔細地介紹了這本書。

很明顯，僅僅是翻譯本書序言與發表評論文章對於繼續深入地研究工作顯然很不够。尤其近幾年來中國的敦煌學研究隊伍在不斷擴大，但很多人却很少懂得與能够直接閱讀俄文原著。在此以前，雖然在蘇聯出版了較多的敦煌學研究專著，但中國敦煌學界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不可能有什麼作為。蘇聯科學家也

沒有去中國的可能性。很多專家從法國、日本、美國、新加坡、香港地區來列寧格勒，但是沒有中國大陸同行來。有時在中國的敦煌研究著作、雜誌上零星地提到蘇聯藏有敦煌文獻并有研究，但常常否定地說，這是社會帝國主義的學術，妨礙中國的學術，雖然資料在外國，但他們沒有研究的權利。直至八十年代末期，蘇中敦煌學家學術交流逐漸增多，情況很可觀地改變了。中國學者慢慢地了解蘇聯以及其他外國學者的工作，他們才知道以前的成見有欠公允。如果不注意國外的研究，中國敦煌學界也不會有長足的進步。蘇中學者之間的交流，最初是通信，後來實現了人員互訪。其中，有兩次重要的突破：

一、1989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派出了魏同賢率領的代表團，訪問了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東方研究分所。嗣後，雙方又經會談簽署了協議書，決定合作影印出版全部俄藏敦煌抄本。這項工作將持續很多年，現在已經開始。

二、本書主編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曾在中國進修半年(1989年9月至1990年3月)，也幫助發展了中蘇雙方的學術交流。孟列夫是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獻》的俄方主編，在中國進修時去了敦煌、蘭州、銀川、西安、揚州、上海、杭州等藏有敦煌卷子和擁有敦煌學研究機構的城市，拜訪了有關學者。中蘇學術界的交流進一步密切起來了，堅冰已被打破了。

但是，中國同行們，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方，常常不能看到蘇聯發表的研究資料，因為圖書館沒有俄文原著，所以翻譯出版最重要的俄國研究成果勢在必行的建議產生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遠見地組織了一批選題，其中除了翻譯出版本書外，還將在不久的將來出版丘古耶夫斯基(Л. И. Чугуевский)的《敦煌漢文文書》等譯稿。毫無疑問，這將大大有助於今天與將來的中俄乃至整個世界的敦煌學的發展。

本書是在 1957 年由孟列夫一人開始編寫的。後來組成小組，最初為孟列夫、史更良（С. А. Школяр）、斯皮林（В. С. Спирын）三人。往後小組擴大。三十五年間，小組的成員迭有更動，唯有孟列夫與丘古耶夫斯基一如既往地仍然在研究敦煌文獻。

本書共收敦煌卷子近 3 千號，但在我們的工作卡片與手稿上已準備到 4 千—5 千號。而且直至最近，我們又發現在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其他抄本庫藏中，還有未登錄的敦煌遺書，所以我們的藏量至少在 1 萬 8 千號以上。當然，就應該繼續不懈地工作，什麼時候能到達終點還不能說。由於發現了很多可以連接或有聯繫的碎片，也因為以前我們的知識不夠，有的卷子在那時查不到佛藏、道藏及四部書的書名、篇名及作者名，再加上我們做叙錄的方法也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所以本書的中文版將有可能作些局部的修改。只是框架已定，還有不少的新成果無法反映到書中去。

今天，我們的國名也改變了，蘇聯科學院也因此改為俄羅斯科學院。我們研究所的名稱也屢經更改：

1918—1929 年名亞洲博物館；

1930—1955 年名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1956—1968 年名亞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1968—1991 年名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1991 年，如同列寧格勒改稱聖彼得堡一樣，我們所也改名為聖彼得堡分所。所以本書有這些名字的變化，讀者不應該奇怪。這些改變在中國也是常見的。

最後，讓我們記錄所有參與本書（《叙錄》第一、二冊）編著工作者的名字：

孟列夫，中國文學史研究員，着重研究敦煌變文。《俄藏敦煌文獻》俄方主編，本書主編。

丘古耶夫斯基，研究敦煌漢文文書。負責本所敦煌文獻蒐集

保存工作，繼續編製卡片目錄。《俄藏敦煌文獻》俄方副主編，審訂本書部分叙錄稿。

沃羅比約娃 - 捷霞托夫斯卡婭 (М. И. Воробьева - Десятковская)，本所寫本部主任，中亞細亞、印度、漢語言研究者，參與本書第一、二冊的編著。

古列維奇 (И. С. Гуревич)，變文研究員，同時研究漢語歷史語法，參與本書第一冊的編著。

左義林 (И. Т. Зограф)，研究中古漢語歷史語法，包括變文語法，參與本書第二冊的編著。

馬特諾夫 (А. С. Мартынов)，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參與本書第二冊的編著。

斯米諾夫 (Б. Л. Смирнов)，參與本書第二冊的編著，并編製全書索引，今住澳洲。

斯皮林，研究中國古代邏輯史，參與本書第一冊的編著。

史更良，研究中國兵法史，參與本書第一冊的編著。

鄭麗媛，參與本書第一、二冊大部分卡片的製作工作。

此外，還有如下三人參加了卡片編目工作：巴甫洛夫斯卡婭 (Л. К. Павловская)、維諾格拉多夫 (Е. В. Виноградов)、哈寧 (З. Я. Ханин)。

本書是中俄合作在上海出版的第一部敦煌學研究著作，希望接踵而來的是大批的俄藏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資料與研究成果在上海的發表與出版。

孟列夫

1992.3.18 于聖彼得堡

(蔣維崧譯)

## 俄文版第一冊序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有大量敦煌文獻，為公元 5—11 世紀中國古代寫卷的珍品。這是奧登堡院士 1914—1915 年間領導的俄國西域考察團帶回來的。該考察團對敦煌石窟做了編目工作<sup>①</sup>，並進行了發掘，中國寫卷藏品，就是這些工作的成果。應該補充說明的是：為數不多的一部分寫卷，是奧登堡為首的 1909—1910 年第一次吐魯番考察團帶回來的。還有部分寫卷，是駐烏魯木齊俄國總領事 H. H. 克羅特科夫于 1909—1910 年收集的，以及 C. E. 馬洛夫的和闐考察團帶回，交給該研究所文獻館的。但是，收藏的文獻除少數寫卷以外不登記來源，也沒有另外編號的記載。

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的寫卷，是佛教寺院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是中國通往西方——中央亞細亞、中亞、克什米爾和印度這條中西大道上的重鎮<sup>②</sup>。第一批石窟大約是公元 366 年開鑿的。當時，佛教通過克什米爾和中亞傳到中國北部，並成為這一地區的主要宗教。中國佛教的興盛持續到 11 世紀中葉。由於多種原因（中國官方的壓制、佛教廣泛傳播地區的長期戰亂、伊斯蘭教的滲入），導致佛教在中國的衰落。11 世紀之後，大多數石窟寺廟只是勉強維持下來，石窟里很少出現新的壁畫和塑像。保管人員不能經常地進行妥善的修復工作。在 4—11 世紀的寺廟石窟裏（其中也包括莫高窟），有如此大量的彩繪壁畫、塑像、半浮雕像、藻井和裝飾圖案等，使這些石窟堪稱為一座座規模宏大的，自發形成的中國古

代藝術史的寶庫，而名列前茅的是敦煌石窟<sup>③</sup>。

莫高窟，不僅以它的藝術古迹，而且也因它的寫卷珍藏而聞名于世。它在同類的藝術寶庫中是首屈一指的，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一座古代寺院的珍藏能與之媲美。

敦煌的大量寫卷，是 5—11 世紀由寺院的僧人收集的。除佛教經典著作外，寫卷中還有中國儒家和道家的經典著作、後來的道教著作和醫學著作、占卜和曆法、文學和詩歌、官方文件和經濟文書等作品。由于敦煌縣地處經常遭受遊牧民族的掠奪，多次劃歸非漢人政權版圖的地區，所以，莫高窟這座藝術寶庫及其珍藏品，經常受到毀壞的威脅，甚至有完全被毀滅的可能<sup>④</sup>。

顯然，為了保護珍藏品免遭毀滅，故將收藏寫卷的石窟入口封閉，并在灰泥外面畫上彩繪壁畫，使寶庫密藏起來，防止外人發現。儘管最後一件注明日期的敦煌寫卷上標的是 1002 年，但是，還有一些年代更晚的寫卷。因此，自然可以推測，封存寶庫的時間，大約是党項（西夏）族占領敦煌的那一年。以後，由于敦煌廟宇石窟不再是佛教活動的中心，因此，藏有寫卷的石窟寶庫也就被人們遺忘了。

直至 20 世紀初，敦煌石窟仍是不被人們注意的荒廢之所。只有為數不多的僧人（他們常常不是佛僧，而是道士）來照料這些石窟，但很少做修復工作或從彩繪壁畫上清理掉風吹的沙塵。1900 年 5 月 26 日，一名道士王圓籙清理壁畫時，偶然地發現了被封存的藏經洞口。這就是以後舉世聞名的敦煌寫卷寶庫<sup>⑤</sup>。

現在，世界上有四大敦煌寫卷文獻館，分別設在北京、倫敦、巴黎和聖彼得堡。此外，還有一小部分寫卷珍藏在日本以及中國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手裏。北京<sup>⑥</sup>、巴黎<sup>⑦</sup>、倫敦<sup>⑧</sup>、日本（京都）<sup>⑨</sup>等文獻館藏品的完整目錄，已公諸于世。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敦煌文獻藏品，尚未編出完整的目錄。1930 年，曾公布了有關我們敦煌藏品的第一批

文獻資料<sup>⑩</sup>。大概從這時起，就由 K.K. 弗盧格對敦煌文獻資料進行系統的研究整理，對篇幅最大的 307 件寫卷加以編目。K.K. 弗盧格生前整理的 2000 多件藏品也已登記造冊。弗盧格的某些研究成果，已在書訊通報上發表了<sup>⑪</sup>。1942 年正月，正當列寧格勒被法西斯德國封鎖之際，他為時過早地與世長辭，因而對敦煌文獻藏品的研究工作，便長期中斷了。

1957 年 2 月，由青年研究人員 Л. Н. 緬希科夫（孟列夫）、B. C. 斯皮林、C. A. 什科利亞爾（史更良）組成專門小組，又重新開始了研究工作。B. C. 科洛科洛夫（國質生）教授積極地參加小組的組織工作，小組還經常得到他的幫助和有益的指教。後來，M. И. 沃羅比約娃－捷霞托夫斯卡婭和 И. С. 古列維奇也參加了這個小組。這部第一冊敘錄，就是他們五人編寫的，共有 1707 個條目。中國朋友，首先是已故的鄭振鐸教授，曾給予我們大力幫助；還有梁希彥教授，特別是鮑正鵠教授，曾給予我們多方面幫助。對此，我們銘記不忘，並表示衷心感謝。

在小組開始工作之前，我們將珍藏品作了初步的修復工作：將各件寫卷彼此分開，經過加固、整平，整理成便于進行研究的形式。在 Б. И. 潘科夫的指導下，P. B. 康定斯卡婭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由 M. П. 沃爾科娃編成的全部珍藏品編目冊，保證了小組有組織地從事不間斷的工作。

下面簡略地談一下本冊敘錄的寫卷內容。

根據已公布目錄的總內容可以確定，敦煌寫卷的主要部分是佛經<sup>⑫</sup>。我們的珍藏品也不例外（1707 個條目中就有 1412 條）。所以，佛經部分在本書中占據了第一位。收入第一冊的非佛經作品有：文學作品（散文和詩歌）49 件；中國傳統思想（儒家和道家）作品和科學文獻 40 件；各種字典和書法練習寫本 15 件；官方文件、經濟文書和藏書目錄 148 件。有許多非佛學作品和相當少一部分中國佛教經文，都是獨一無二的作品，以前未見記載。如在敦

煌石窟裏發現的俗文學的敘事性變文作品，開創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階段。所以，儘管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可以列入“佛學”篇的，但是在這裏仍將變文收入“文學”部分。在佛經翻譯作品中，還有許多曾認為已散佚的作品，首次在我們的珍藏品中發現。所有這些材料都只是第一次出版，並可能僅僅是初步發表。只有完成全部珍藏品的敘錄工作以後，才能對其進行最終的評述。

本冊編者認為，將 K. K. 弗盧格所研究編目的一切珍品全部列入本冊，是他們的職責。弗盧格編目的 307 個條目，基本上保持不變，補編的僅是本冊編者所發現的材料。讀者很容易根據編號“Φ”(Флут 第一個字母)識別出弗盧格編目的那一部分，其餘寫卷均用編號“Дх”(Дуньхуан 地名中的兩個字母)表示。若某件寫卷已列入弗盧格發表過的《古代漢文佛經寫卷簡明目録》，則在本冊該寫卷敘錄之後指出弗盧格編目的號碼。

編入三藏的全部佛經作品，均是按照 1924—1928 年日本東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進行編排的。

其餘的篇章無需解釋。每件單獨寫卷的解說編目，均由以下各部分組成：

一、編目的順序號和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寫卷入藏書號。

二、寫卷的標題。如果某件寫卷無標題，就根據文意重新擬出標題，放在方括號中。如果寫卷中有篇章標題，那麼，便照樣注明。凡某一標題有大量的寫卷時，便在該組全部寫卷敘錄之前加以說明。此外，如果知道作者，就注明其姓名。凡是印度佛教作品的譯文，標題中同時指出其梵文名稱，并用拉丁字母拼音注明。如果作者或譯者是印度人，也同樣注明其梵文姓名。如果寫卷無法確定，盡可能指出其時間和內容。

三、引出著錄有該作品題目的書目和參考書籍。指出我們所擁有的敦煌目錄和參考書籍。在其他參考資料中，僅注明對該寫



卷進行辨認和叙錄時所使用的那部分。

#### 四、列入寫卷外觀資料的有：

1. 測量數據和殘缺情況(寫卷的尺寸按釐米計算)。
2. 寫卷的紙數、行數以及每行的字數。絕大多數寫卷是數張紙黏合成一長軸形紙卷。但是,在寫卷中也有經折裝的,或者裝訂成小冊子的。後兩種寫卷形式會有記錄。
3. 紙張、紙質、紙色。
4. 畫行情況及其特點。
5. 字體及其特點。
6. 寫卷標題。如果寫卷上有幾種不同的標題,不同標題分別記錄。多次注明標題顯得很必要的原因是:保存完好的寫卷有三處書寫標題——正文開頭(首題),正文結尾(尾題)和寫卷卷首背面,往往是寫在專門黏貼在卷首的一小張紙上(外題)。用外題是為了不展開寫卷就能看出它的題目。然後依據題目確定大藏經相對的文獻標題。
7. 藏書的各種記號,通常記在外題下面,表示該書的卷號和帙號,卷號用《千字文》中的字來表示。《千字文》,就是用不重複的一千字編成的一篇文章,該文常被用作多卷本的書號;帙號,就是裝入十卷為一帙的序號。
8. 附記、寫卷記錄等對本文進行補充的記載,如果能獨立成篇,那就全部抄錄。

#### 9. 寫卷背面的文字情況。

五、寫卷的日期(大部分是近似的),寫在外觀資料叙錄之後。因為,大多數的日期都是根據間接資料如紙張、書法、畫行等推定的。例如,5—6世紀的紙,特點是紙色白或灰,紙質硬而脆,顯然是由于塗底劑料的性質所決定的。後來,到了6—8世紀,紙張變得更薄更有彈性。大約從唐初(7世紀)起,薄紙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染深黃顏色。唐代(618—906年),特別是唐代中期(8—9世